

# 理想與現實兼具： 大觀園空間特質辨析

張博鈞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 提 要

大觀園空間特質理想與現實兼具，持理想世界論者多以烏托邦與樂園稱之，本文透過耙梳二詞的定義，指出大觀園與烏托邦、樂園之間的差異，並進一步援引傅柯「異托邦」的空間概念，試圖重新詮釋大觀園理想與現實兼具的空間特質。由於異托邦除了相對於既有的現實空間之外，本身亦容許相互衝突、矛盾的異質共存，因此將大觀園視為異托邦，方能在大觀園中同時納入理想與現實、純淨與污穢，也才更能理解大觀園如何在兩種力量的拉扯下逐步走向滅亡。唯有正視光明與黑暗的兩者並存，才能確切理解大觀園內部的糾結，也才能更進一步瞭解大觀園在《紅樓夢》整體設計的空間意義。

**關鍵詞：**《紅樓夢》 大觀園 空間特質 異托邦 異質空間

# 理想與現實兼具： 大觀園空間特質辨析

張博鈞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 一、前言

余英時大觀園「理想世界」論的提出<sup>①</sup>，不僅標誌紅學研究「新典範」<sup>②</sup>的建立，對其後紅學界於大觀園空間特質之認取，亦有極大的影響。自余文發表以降，視大觀園為一理想、清淨的世界，幾已成為紅學研究者的共識<sup>③</sup>。然而，針對此一論點，亦有諸多學者不表贊同，如：蔡義江即表示「大觀園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存在著污穢、眼淚、掙扎和反抗」<sup>④</sup>；裔錦聲透過對中國古典小

- 
- ① 關於大觀園理想性的提出，余英時並非首倡，在他之前，脂硯齋、二知道人、張文正、夏志清、宋淇等人均曾提及，只是未成體系。
  - ② 余英時語。余氏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提出，紅學研究已經到了必須建立新典範的時候，這個新典範「注重紅樓夢作者在藝術創作上的企圖，並且要通過全書的內在結構來發掘這種企圖」，他並且指出，其〈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正是新典範的嘗試之作。見氏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頁21-23。
  - ③ 如：馮其庸《紅樓夢概論》認為大觀園是地靈人傑的世界，是少男少女們的樂園，是與奸佞邪惡的現實世界相隔的桃源仙境。（與李廣柏合著，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年。）郭玉雯〈《紅樓夢》與魏晉名士思想〉亦提及大觀園是典型的園林樂地。（《漢學研究》卷21第1期（2003年），頁361。）歐麗娟〈賈寶玉的〈四時即事詩〉：樂園的開幕頌歌〉文中亦明白將大觀園視為理想樂園。（氏著：《詩論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此外，張錦池、李豔梅、許麗芳、李舜華、王向東、裘新江等諸多學者所持看法亦皆類似，不再贅引。
  - ④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鑑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94。

說、戲曲中花園典型譜系的耙梳，指出：「置身于這樣的文化傳統和花園背景下，有著致命瑕疵的大觀園不是一座能夠實現理想愛情的花園，也不是一方『淨土』」<sup>⑤</sup>；陳維昭則認為：「宋、余對大觀園的闡釋明顯地迴避了大觀園的現實性，把賈寶玉對大觀園的理想化等同於大觀園的理想性。」<sup>⑥</sup> 這些文章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程度地點出大觀園本身的現實性——人世間的醜陋、汙穢、算計、傾軋等負面因素，同樣存在於此一空間之中，它在《紅樓夢》文本中並非做為一個理想世界而存在。

平心而論，大觀園實乃一兼具現實性與理想性之空間，它確實存在於《紅樓夢》文本的現實之中，與小說中的現實世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讀者的閱讀感受中，大觀園又實在予人以強烈的理想性，是清淨、完美、純粹的詩意空間，致使在後代讀者眼中，多視之為理想世界，屢屢以「烏托邦」、「樂園」等詞語稱之。因此本文擬透過對詞語意義的耙梳，首先討論大觀園、烏托邦、樂園三者之間，在意義上是否能夠相互聯繫、含攝，它在文本現實中的樣態，與該詞語之定義又存在哪些鑿柄不合之處。其次，擬藉由傅柯提出的「異托邦」（或稱「異質空間」）之概念，重新理解大觀園理想、現實兼具之空間特質。

## 二、幻滅與前瞻：背道而馳的發展方向

在詮釋大觀園空間特質時，若將大觀園視為一理想世界，則烏托邦、樂園、淨土、桃花源、仙境等詞彙，往往彼此混用，一律被視為理想世界的代稱。在此論述脈絡下，由於各個詞彙長期交相混用，諸詞原本具有的，各自不同的內涵、意義均被消解。忽略眾多詞彙之間的個別差異，只根據表面意義的雷同，便將其

<sup>⑤</sup> （美）喬錦聲：《紅樓夢：愛的寓言》（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12月），頁155。

<sup>⑥</sup> 陳維昭：〈解讀大觀園：透視紅學與20世紀文化思潮〉，《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卷16第4期（2000年），頁5。陳氏此語雖然頗具啟發性，但其文針對余文的批評，卻有將余文簡單化的傾向；另外，文中在提及寶玉始終糾纏在一種矛盾的痛苦中時，論述卻明顯將情節的前後順序誤植，以致作出錯誤解讀。

簡單地同化，難免產生誤用及矛盾，其中尤以「烏托邦」與「樂園」二語的混用最為常見。

「烏托邦 (Utopia)」係指英國政治家及作家湯瑪斯·摩爾爵士 (Sir Tomas More, 1480-1535A.D.) 於西元一五一六年出版的作品，書中記述一個具有理想法律和社會條件的想像國度。「烏托邦 (Utopia)」一詞自從摩爾創立、使用以來，歷經近五百年的發展，詞義在長期的使用下，越發曖昧不明。歐麗娟即表示：「『烏托邦』一詞的意涵已幾乎到了難以定義的地步，它可以指想像上的、無限遙遠的地方，如島嶼、鄉村、區域或場所等處；還常常主要用來指在法律、政府和社會條件方面具有理想之完美的地方、城邦或狀態；也可以指一種特別是為了社會進步，但卻不切實際、並且通常是理想到難以達成的計畫。」<sup>7</sup> 其意義的複雜含混，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烏托邦一詞的涵義雖然混淆難辨，但在諸多曖昧相雜的說法中，其實仍能嘗試為烏托邦一詞劃出一個相對明顯的界定。張惠娟在耙梳晚近烏托邦研究概況時，曾引用舒文 (Darko Suvin) 之語，稱烏托邦為「一個特定的準人類社區 (a quasi-human community) 的文字呈現。此社區之社會與政治機制、行為模式、以及群己關係之運作原則皆較作者之社區完美」，文中又指出「烏托邦一方面具備飛揚的前瞻視野，一方面卻也能正視社會現狀和歷史現實。」<sup>8</sup> 由此可見，烏托邦並不是離開現實而獨立存在的空間，它的一切設計皆是以對治現實為首要目的，正是因為對現實有著清楚的了解，從而產生一種「前瞻式的期望」<sup>9</sup>。另外，張惠娟亦曾指出烏托邦的基本風貌是「動態」的，是「一個理想與現實交織、美好與醜惡交融所構築的一個活潑的園地」、「其 (烏托邦) 對於現實的關切和期許，正為種種理想陳述背後的動因」、「烏托邦作家於描述心目中的理想國時，能同時正視『現實』的一切缺失，希冀由『虛構』來引領『現

<sup>7</sup>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初版），頁11。

<sup>8</sup> 兩段引文均見張惠娟：〈山色空濛雨亦奇——烏托邦研究近貌〉，《中外文學》卷25第3期（1996年），頁257、258。（DOI:10.6637/CWLQ.1996.25(3).254-264）

<sup>9</sup> 同前註，頁258。

實』踏出舊門檻，以至二者終融合為一」、「其藉由刻畫『完美』的政治典章制度、試圖化腐朽為神奇的心態，在在顯示其與樂園神話大相逕庭。」<sup>10</sup>

透過以上論述，可知烏托邦理想的提出，是產生自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其中關於理想國典章制度的種種描述，都是針對現實的問題而闡發，它與現實的關係是辯證而能動的，最終是希望能夠使此虛構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相融合，亦即能在現實世界中實踐烏托邦的理想。因此烏托邦並非一個虛無飄渺的海外仙境，它的創作與構思是以實踐為目標，它的目光是投向未來的美好，是積極精神的體現與光明遠景的描繪，其中在在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前瞻性格。

持此論點以觀察大觀園的設計，可以明顯發現兩者之間具有諸多鑿柄之處。在眾多將大觀園視為烏托邦的論述文章中，當以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最具代表性。其文開宗明義便即指出：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想分別叫它們做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sup>11</sup>

仔細閱讀〈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其實不難看出余氏努力要將大觀園建構為烏托邦的企圖。他在文中明確地指出「紅樓夢中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而這兩個世界「不但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這種關係是動態的，即採取一種確定的方向的。」同時，余氏還特別提出「大觀園的秩序是以『情』為主」<sup>12</sup>，明顯不同於大觀園以外的世界。至此，余英時所著意勾勒的大觀園似乎均合於烏托邦的定義，他提及理想世界源出於現實世界，並點出兩個世界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此一動態具有一個確定的方向，同時明白指出

<sup>10</sup> 以上數段引文均見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卷15第3期（1986年），頁81、82。（DOI:10.6637/CWLQ.1986.15(3).78-100）

<sup>11</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收入《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41。

<sup>12</sup> 同前註，頁50、51、54。

這個世界自有其秩序。但若再進一步思索，大觀園與烏托邦之間的差異便凸顯出來，茲就構築緣由、動態關係、空間秩序分點論述之。

### （一）空間構築的緣由

大觀園的確建築在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但它的出現並不是因為正視現實世界的缺失，也不以對治現實世界的問題為主要目標。它的出現恰恰是出於現實世界的實際需要——元妃省親——而來。因此，大觀園的體制、規模、制度，無一不是遵循現實世界的標準，甚至其全部花用也都是由外在的現實世界提供。張興德即明白地說：「大觀園同賈府和外面世界不是『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而是賈府的一部分，始終受制于賈府，它是現實世界的『縮影』，時刻受外面世界的影響。」<sup>18</sup> 因此寶玉雖然在園中居住，一聽到賈政的叫喚就必須慌慌張張、提心吊膽地立刻出園，大觀園的支出用度也都是與賈府的用度一併計算發放，大觀園無法自外於現實世界，現實世界的問題也無法在大觀園的設計之中得到任何解決的方案，儘管之後大觀園中曾有「敏探春興利除宿弊」，但所謂「興利除弊」既非以大觀園為政策試點，以備日後廣泛施行，其結果亦不能使大觀園從此長治久安，反而暴露出大觀園諸多的危機與矛盾。可見，大觀園構建的初衷並不是出於對現實的關切和期許，也並未正視現實的缺失，它不僅是因應現實的需要而存在，更成為園中諸人（尤其是寶玉）逃避現實的暫時庇護所。

### （二）兩個世界的動態關係

余英時指出大觀園內外的動態關係是建築在「情既相逢必主淫」之上，而它的確定走向便是大觀園的幻滅，此一論點與烏托邦原本積極、光明的前瞻性期望顯然不符。張惠娟在〈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一文中曾指出烏托邦具有辯證的和終極的兩種秩序，其中終極秩序乃指兩個世界（即烏托邦與現實世界）不僅對立，

---

<sup>18</sup> 張興德：〈曹雪芹對「世外桃源」思想的批判——《紅樓夢》的第三種讀法（之三）兼與「大觀園是世外桃源」說商榷〉，《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25第6期（2006年），頁14。

最終烏托邦必須凌駕於現實之上。<sup>14</sup> 據此，大觀園若是烏托邦，其所代表的理想世界之藍圖，必須得以在現實世界之中實踐，亦即透過大觀園這一烏托邦理想之設計，不僅能夠解決現實世界存在的問題，進而能使現實世界成為烏托邦的世界，此即張氏所謂烏托邦最終必須凌駕在現實世界之上。若然，非但大觀園不會毀滅，甚至連原本骯髒、污穢的現實世界，有朝一日都會朝著理想世界邁進，如此一來，烏托邦所具備的前瞻性期望才能全面招展。然而，根據余英時的論點，大觀園的設計從來就不是為了使現實世界跨出舊門檻，反而一開始便注定了毀滅，外在現實是大觀園無法忽略的危害力量，它必然會入侵到大觀園中。「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sup>15</sup>，現實世界反而凌駕於烏托邦之上，原本屬於烏托邦的積極、光明，變成無可奈何的悲劇，動態關係所謂的「確定方向」走上全然相反的面向，其中的設計毫無烏托邦思想的積極性可言。尤有甚者，大觀園面對外在世界的力量時，其實只提供了消極的逃避功能<sup>16</sup>，不管受庇護時有多麼美好，外在現實始終是大觀園永遠無法擺脫的夢魘與威脅，更遑論要藉由大觀園引領現實走出舊門檻，邁向新世界。

### （三）獨立運作的新秩序

余英時提及大觀園的秩序是以「情」為主，但筆者以為「情」所決定的乃是大觀園眾多居住者與寶玉之間的關係，而非大觀園的制度、規範或生活秩序。烏托邦理想既是為對治現實世界的問題而存在，其明顯特色即是「對於政治典章制度的描摹」<sup>17</sup>，且所設計之新秩序理應能在現實世界中操作，但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中，余英時一再提及情榜與大觀園居處佈置的問題，強調大觀園之秩序都應從眾芳與寶玉之間的關係認取，但眾芳與寶玉的關係其實跟大觀園實際

<sup>14</sup>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頁 81。

<sup>15</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收入《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61。

<sup>16</sup> 關於此點，可參見李豔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紅樓夢學刊》第 2 輯（1996 年），頁 91-116。

<sup>17</sup>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頁 82。

運作秩序並無明顯相關，「情」的秩序充其量只提供了大觀園人際關係疏密網絡的解讀，而非討論在《紅樓夢》所構築的世界中，大觀園這一空間與大觀園以外的空間在生活各個方面的實際秩序。誠如前言所述，大觀園的實際秩序仍是依循著現實世界的秩序，大觀園的管理基本上還是附屬在榮國府的管理之下，甚或如王慧所言：「大觀園更多時候是被籠罩在賈府的政治經濟的秩序中，隨著賈府的呼吸心跳而生存。」<sup>18</sup> 或有論者會以為探春理家其實為大觀園建立了新的秩序，但必須指出的是探春所理的家，不僅僅是指大觀園，而是整個賈府上上下下、裡裡外外之事，因此她可決定趙國基身故的賞銀，亦可蠲了賈環、賈蘭上家學的零花費用、撤了買頭油、脂粉的買辦。由此可知，不論是探春理家前或理家後，大觀園的實際秩序均與賈府並無分別，大觀園並非獨立於賈府之外，另立有一套運作的新秩序。

余英時以情榜的排列秩序為基準，發展兩個世界之間的動態關係、能動力量，從而建構出一個負面走向的另類烏托邦，在這樣的兩相比附之下，烏托邦原本具備的積極內涵反而失落，對大觀園空間特質之認取，也難免存在偏頗之處。實際上，大觀園針對它以外的世界而言，雖然是一個相對獨立且特殊的存在，但園內、園外同樣隸屬於榮國府，共用的是一套相同的秩序，遵循著一貫的禮法。大觀園不是現實世界未來光明前景的藍圖展現，它消極的屬性，悲觀的未來，必然毀滅的命運，都與烏托邦充滿前瞻性的定義並不相契。

### 三、消亡與永恆：似是而非的空間樣態

「樂園 (paradise)」或「樂園神話 (Paradisiacal Myths)」一詞，在西方文學中自有其發展譜系，意涵亦相當分歧，但與烏托邦一詞的情況相同——即在諸多分歧的意涵之中，仍可以嘗試去界定出樂園一詞的定義。張惠娟即指出：「樂園神話所呈現的，是一個『靜態』 (static) 的面貌——一個『凝滯

---

<sup>18</sup> 王慧：《大觀園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8月），頁206。

的一點』(a fixed point)，一個絕對的事實(an absolute reality)。」又說：「樂園神話一意規避現實，沉湎於虛構的理想世界中。其所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裡，所有屬於現實的一切不快和缺失全遭摒棄，而呈現出一幅永恆、完美的靜態畫面。其基本精神是隱遁、出世的」<sup>19</sup>可見，樂園是一個與世隔絕，永遠完美的封閉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任何現實的污濁、缺點、憂慮都不復存在。另外，歐麗娟在《唐詩的樂園意識》一書中，根據樂園一詞的諸多意涵，歸納樂園應具備有四項特質，即：樂園是不易到達的；樂園是豐饒而愉悅的；樂園是一個封閉而具有選擇性的小世界；樂園抽離了時間性而使死亡的憂怖消泯不存。<sup>20</sup>結合前人對樂園意涵的歸納，可以明顯看出，所謂的樂園，必須是一個與世隔絕、封閉且不易到達的世界；樂園中居住的成員必須經過篩選；它的美好是靜定而永恆的，在樂園的世界裡並沒有現實的醜惡、死亡的恐懼以及時間的憂慮；樂園的物產豐饒且能自給自足、無須仰賴外界的供給。下文即針對大觀園與樂園之特質相應與否進行論述：

### (一) 仙境別紅塵：遠離世俗，與世隔絕

大觀園既是為元妃省親而建，它的存在本身就具備現實的實用價值，即便在省親之後，眾芳奉諭入園居住，此一實用價值亦未曾失去，只是從皇家御用園林，轉化為世家私人花園。第七十一回提及賈府慶祝賈母八旬生日，由於賓客眾多，便在大觀園中收拾出幾處大地方作為退居<sup>21</sup>，第七十五回更在大觀園舉辦中秋家宴，凡此均點明大觀園存在的世俗性，此一特性和樂園遠離世俗的特點明顯有別。不僅無法遠離世俗，大觀園與外在世界的空間實際上也無法全然隔絕。從書中的描述可知，大觀園基本上是以圍牆、園門區隔於外在世界，圍牆雖然固定

<sup>19</sup> 兩段引文均見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頁80、81。

<sup>20</sup>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頁7-9。

<sup>21</sup> 第七十一回中寫道：「……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作為退居。」見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1103。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版本均與此同，茲不另注。

不可移動，但門戶卻可以開啓、關閉。根據書中描寫，大觀園的門通常只有在夜晚，或是特殊狀況下才會鎖上，如：第十七回寫道：「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關了。」（頁 254）要看園門必須先吩咐將門關上，顯然園門平時是開啓的。又如：第六十二回，寶釵等人從薛蝌處吃酒方回，「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著。」（頁 958）又第七十一回寫道：「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角門上鎖吧。』」（頁 1116）由此可見，大觀園的園門（不論前後大小）若非夜晚或特殊狀況，平日大多開啓，並不是一個絕對封閉的狀態，既然內外並非全然隔絕，兩造之間的流通便成爲可能。針對大觀園內外的流通現象，鳳姐在第七十四回即點出「這個（指銀兩）可以傳遞，什麼不可以傳遞」（頁 1163）的狀況，因此園內的東西會流到園外（如：私語<sup>22</sup>、詩詞、玫瑰露），而園外的事物自然也可以流進園中（如：雜書、繡春囊、茯苓霜、金銀鏢子），在這樣內外私自交相傳遞的情況下，大觀園的封閉性、隔絕性其實相當薄弱。

## （二）未許凡人到此來：天選之民

大觀園中的成員雖然經過篩選，只限寶玉與眾芳入內居住，但在特殊狀況、或是有意爲之的情況下，男子也是可以穿門踏戶進到園中，如第二十五回：

賈母、王夫人見了，唬得抖衣而顫，且「兒」一聲「肉」一聲放聲慟哭。於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千家中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眾媳婦丫頭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園內亂麻一般。（頁 397-398）

---

<sup>22</sup>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燈」——襲人「告密說」析論〉一文曾針對賈府訊息的流通網絡進行建構，其中諸多訊息不只在園內流通，甚至流傳至園外，乃至於有半天路程之遙的史府都曾進入此一訊息網絡之中，可見大觀園的封閉只是表面假象。（氏著：《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

眾芳在第二十三回才住進大觀園，這個原本應是「未許凡人到此來」的女兒國，卻在第二十五回時就闖入一大堆男子。另外，在第七十五回中，賈母在中秋節時更帶領一眾男子進入園中賞月夜宴。除此之外，賈環、賈琮（第六十回）、賈蘭（第二十六回）亦均曾入園，賈薔跟賈芸也曾藉職務之便進入大觀園，賈薔更是大刺刺地跑到梨香院<sup>23</sup>去向齡官獻殷勤，由此可知，男子並不是絕對不能進入大觀園，只是不在其中居住。

余英時和宋淇在論述大觀園的理想性時，特別強調大觀園是女子居所，除了少數例外，男子鮮少能夠入到園中，這一點基本上筆者是同意的。但男子鮮能進入園中，並不代表大觀園的理想性就得到必然的保障，在《紅樓夢》的人物論述中，男子雖然渾濁污穢，但有一類人比之於男子卻更加糟糕，而這種人卻沒有被排除在大觀園之外。<sup>24</sup>第五十九回透過小丫頭春燕之口說道：「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得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頁 920）。在第七十七回，寶玉更明確地說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

- 
- <sup>23</sup> 關於梨香院的地點問題，葛真在〈大觀園平面圖研究〉中指出：「梨香院的位置，很不易確定。……需要很好的考慮。」但葛真考慮到最後也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只說梨香院在大觀園東南角，且兩者之間有門可通。曾保泉，〈尋得桃源好繪圖——大觀園布局的初步探索〉則指出梨香院在「進園門後東邊，怡紅院南邊」；戴不凡：〈曹雪芹「拆建改建」大觀園〉一文則耙梳《紅樓夢》的增刪過程，提出：「由於新稿將榮府新花園搬到東邊來，並『改建』成大觀園，這就不能不將梨香院範圍進去，於是只得讓薛姨媽一家搬到『東北上』一座坐落不明的房宇中去了。」另外，〈大觀園圖說〉中亦指出梨香院後入大觀園中。（上述諸文均收錄在《大觀園論集》（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由此可知，若非薛姨媽原本所居的梨香院就在大觀園的範圍中，否則在建造大觀園時，薛姨媽其實沒有搬家的必要。又第五十四回中，賈母傳喚梨香院女伶出來演戲，眾媳婦們是「往大觀園去傳人」，可知梨香院當在大觀園中。
- <sup>24</sup> 關於這點，余英時在〈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一文中也曾經提及：「理想世界的大觀園是儘量不讓已婚的女子住進來。（這當然是指書中的主要角色，不包括伺候她們的『老婆子』之類）。」（氏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134。）然而，這樣的作法卻忽略了這些數量眾多的「老婆子」們，對主要角色可能帶來的心理壓力，她們的存在對大觀園的空間特質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不可略而不論。

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頁 1213）可見根據《紅樓夢》的價值觀，魚眼睛比之男子更為可殺、可恨，魚眼睛因為是女性，無須芥蒂男女之防，所以她們可以隨意出入大觀園，甚至是日夜在裡頭當差、值宿<sup>25</sup>，而這些魚眼睛「又深恨他們（指大丫鬢）素日大樣」（頁 1212），寶珠們受到欺辱傷害，她們「心中各各稱願」（頁 931），因此她們的存在，本身便是眾寶珠們的威脅與戕害，抄檢大觀園一事，基本上正是魚眼睛們聯合起來對眾無價寶珠發動的一次圍剿。<sup>26</sup>

因此，就大觀園成員經過篩選這點來說，表面上似乎符合樂園成員須經過篩選這一條件，但細究起來，由於大觀園並非全然封閉的空間，不僅男性能假藉其他因素進入園中，而不受性別限制、比男子更可殺的魚眼睛們，又因「天選之民」篩選條件之疏漏，得以在大觀園來去自如，導致樂園空間產生縫隙，從而使大觀園的理想性無法獲得足夠的保障。

### （三）倦繡佳人幽夢長：靜定永恆的美好

美好之靜定、永恆是樂園之所以為樂園最重要的要素，它必須被凝結在最為完善的狀態，時間感在這個空間中不允許存在。但顯而易見的是，時光的推移在大觀園中並沒有被抽離，相反的，時間正是奪去大觀園所有美好的兇手，宋淇即指出：「有一個重要因素使大觀園的繼續存在不可能。這因素不是別的，就是『時間』。」<sup>27</sup>的確，大觀園中所有的美好與歡樂，除了歸功於元妃與賈母的雙

---

<sup>25</sup> 第二十三回眾芳遷居大觀園時，書中寫到「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嫗」（頁 363），此外尚有各人的奶娘親隨，以及專管打掃之人，這類粗使的傭僕，大多是老婆子。第五十六回即明白點出：「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他們（指老媽媽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頁 873）可見大觀園中的魚眼睛著實不少。

<sup>26</sup> 關於抄檢大觀園、向王夫人告密的真兇，可參見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燈」——襲人「告密說」析論〉一文。

<sup>27</sup> 宋淇：〈論大觀園〉，《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頁 25。

重保護外，還必須取決於園內女子的長居未嫁。寶玉便曾明確地說：「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頁 552）可見眾芳未嫁正是支撐大觀園理想，或者說是寶玉理想的最重要基礎，但成長是不可抗拒的，園中女子必然一個個到達必須許婚字人的年紀，就連寶玉在年紀漸長之後，也不能繼續住在大觀園中，在第七十七回，王夫人即明確地表示：「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頁 1215）顯然在大觀園中的女子尚未全部出嫁之際，寶玉就有被迫搬離大觀園的可能。即便寶玉不搬，此時的大觀園也已是朝不保夕，因此第七十八回寶玉得知寶釵搬出大觀園後，曹雪芹就寫道：

寶玉聽了，怔了半天，因看著那院中的香藤異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淒涼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默默出來，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埭上也半日無人來往，不似當日各處房中丫鬟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埭下之水，仍是溶溶脈脈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畫、芳官等五個；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寶釵等一處；迎春雖尚未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於事。不如還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來還是和襲人廝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的。（頁 1235-1236）

現實無常、歲月無情狠狠觸痛了寶玉，對寶玉而言悲痛無已的生離死別、物是人非，在天地之中，不過「仍是溶溶脈脈的流將過去」之尋常。至此，寶玉終於深刻地認識到生命的不可依恃，但他仍慣性地要逃避此一現實，正如他看見園中枯荷時，直覺反應要人來拔去是一樣的。然而，寶玉認為可以同死同歸的黛玉此時未歸，實是對其逃避的示警，但寶玉仍是「不忍悲感」，又一次選擇了逃避現實。由此可見，在時間的無情流動下，看似美好的大觀園必然走到風流雲散的悲

涼末日，來日黛玉與襲人一死一去，面對無情的現實，寶玉終將退無可退。可見，作為樂園最重要的一個特質：時間感的抽離，大觀園顯然並未具備。

#### （四）盛世無飢餓：物產豐饒，自給自足

前文曾經提及大觀園的各項支出用度，無法與榮府的用度割離，園中眾人的月錢均經由鳳姐手中，會同整個賈府的情況一起發放，許多事項其實都如鳳姐所說，是「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第五十一回，頁 796），而如何添減的標準，自然是依據整個賈府的收支狀況進行調整。即便日後探春著手興利除弊，將大觀園各處分發眾人管顧，以花、竹、香草等變賣所得之資來供應大觀園用度所需，其中收支是否平衡尚且難說，就算收支平衡，園中之物要想換成金錢，必然需要與外在世界進行交易，而園中諸多使用什物，如：頭油、胭脂、水粉、衣物、書籍、文具等，均非大觀園內部所能獨立供給。因此大觀園儘管物產豐饒，但要算上自給自足，尚有一段距離，遑論完全擺脫與外在世界的聯繫。

由此觀之，大觀園實際情況與樂園所需具備的特質其實並不符合，所謂靜止、永恆、完美、封閉、自給自足等樂園特質，作為賈府私家園林的大觀園其實並不具備。樂園基本上應是永恆、靜定的完美存在，但大觀園卻必然走向「悲涼之霧，遍被華林」<sup>28</sup>的毀滅之途，兩者之間的差距是明顯可見的。若將大觀園視為如同樂園一般的理想世界，則上述關於大觀園的諸多現實面均難免受到忽略，從而導致對大觀園的空間特質作出錯誤的解讀。

透過以上的論述，明顯可以看出，樂園與烏托邦的意涵儘管同樣指向理想世界，但兩者在本質上其實存在極大的不同，張惠娟曾明確說道：「烏托邦的動態性、前瞻、積極、入世、及強調政治、社會層面的傾向，恰與樂園神話的靜態性、懷舊、消極、出世、及強調放任、無為、獨善其身的心態完全相反。」<sup>29</sup> 由此可見，即使大觀園真是一個理想世界，它也不可能同時既是樂園又是烏托邦，

<sup>28</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 212。

<sup>29</sup>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頁 84。

因為兩者在性質上完全背道而馳。據此，若將兩者混用以描述大觀園的空間特質，不但對兩個詞語而言都是一種誤用，勢必也會扭曲大觀園的空間特質，即便是將兩者分開使用以詮釋大觀園的空間特質，所持的論點亦未必正確<sup>30</sup>。

#### 四、投影俗界的異質空間

大觀園既不同於烏托邦，亦不同於樂園，同時由於其中明顯含有諸多現實矛盾，所以它也不是一個遠離世俗，可以與現實世界全然分割的理想世界，它似乎帶有烏托邦、樂園的表徵，但其內涵卻與之迥不相侔。做為一個存在於現實之中的古典園林，它既不能脫離現實而存在，卻又帶著看似理想的柔焦濾鏡，使無數讀者為其詩情畫意嚮往不已，如此特質，適可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空間概念——「異托邦（*hétérotopie*）」（或稱「異質空間（*espace hétérogène*）」），來重新理解大觀園的空間特質。

所謂「異托邦」指的是由諸多複雜關係所構成的另類空間<sup>31</sup>，而大觀園正是此一另類空間的具體展現，因為它從建置到成為眾芳居住之所，甚至大觀園的制度及其中的諸般設計，其實都與現實世界的複雜關係有所聯繫，是當時諸多現實力量共同匯聚所致。李豔梅在〈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一

---

<sup>30</sup> 如：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稱大觀園為烏托邦的世界，在其論述過程中，並未將烏托邦與樂園混淆，文中亦未曾出現過樂園這一字眼，可見余英時對於烏托邦、樂園兩者之間差異是有明確認知的。儘管如此，余英時雖然試圖建立大觀園與烏托邦的聯繫，但兩者之間的差異仍是難以補綴的。

<sup>31</sup> 本文所援引的傅柯「異托邦 / 異質空間」之理論，詳見 Miche-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J].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e*, October, 1984. 又楊凱麟指出異托邦乃是一種各自差異的「複線集合」（*ensemble multilinéaire*），此一概念所涉及的「不只是什麼是構成這些裝置的複線，這些抽象之線的性質或特性，而且涉及的是由它們的複雜關係所指向的異質空間。」而傅柯主要欲透過異質空間的分析，以釐清諸多複線之間的力量關係。見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撲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15 第 3 期（2005 年），頁 78。（DOI: 10.30103/NICLP.200509.0004）

文中，具體論述了大觀園如何在父權制的名實空隙下，取得了建置的正當理由，同時因為皇權依附者——元妃越位行使君權，使得大觀園得以成為眾芳居所，直接促使女兒國的成立<sup>32</sup>，其中其實涉及種種權力關係的拉扯。此外，作為一個「異托邦」，傅柯曾指出其構成通常具備六個明顯的特點<sup>33</sup>，下文即根據大觀園的存在狀況，逐點說明。

### （一）危機異托邦

首先，傅柯明確指出，所有的社會文化都有「異托邦」的存在，只是其展現的形式各自不一。在諸多不同的形式中，龔卓軍指出其中有一類被稱為「危機異托邦（*hétérotopies de crise*）」，它像是初民社會中的少年屋，或者說要度過成年禮的這樣的空間，其所代表的是「在不特定的過渡場所中度過其關係角色的轉變」<sup>34</sup>，筆者以為《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正屬於此類。廖咸浩指出《紅樓夢》存在兩種世界的衝突，主要包括女人與男人的世界、大觀園內、外的世界以及少年世界和成人世界，且「前兩組世界的衝突在本質上皆由少年世界與成人世界的衝突所貫穿」，而欲從少年出發詮釋《紅樓夢》一書，則必須從「成長小說」的角度來閱讀它。因此他參照西方成長小說定義，結合宋明理學的發展與分化，認為要到明末重情說興起，「少年的價值才隨之獲得足夠的重視」，在此基礎之上，

<sup>32</sup> 李豔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一文第二節，頁95-99。

<sup>33</sup> 關於「異托邦」構成的六個明顯特點之歸納，主要參考：童明：〈做為異托邦的江南園林〉，《建築學報》（2017年12月），頁98-105。周寧：〈花園：戲曲想象的異托邦〉，《戲劇文學》（2004年3月），頁22-26。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撲學」〉，頁75-96，及龔卓軍：〈感性混搭：從空間詩學到異質空間〉「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363-390。另外，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卷32第4期（2003年），頁45-65（DOI:10.6637/CWLQ.2003.32(4).45-65）一文以「異托邦」概念分析鹿港民俗活動「暗訪」，給予筆者頗多啟發。

<sup>34</sup> 龔卓軍：〈異質空間中的移動——從詩學空間到網絡空間〉，《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379。

中國成長小說方能臻至《紅樓夢》的境界。<sup>35</sup> 據此，則《紅樓夢》之為成長小說，殆無疑義，而大觀園作為群芳聚居的園林，其實是他們從青春時期過渡到成人时期的主要空間場域，亦即前述龔氏所謂的「危機異托邦」。在遷居大觀園之前，元妃所下之諭便是要寶玉隨進去讀書，賈政也要他「同你姐妹在園裡讀書寫字」（頁 362）、用心習學、安份守常，而在第四十二回，林黛玉則指出李紈在大觀園負責的是「帶著我們作針線教道理」（頁 653）。可見大觀園其實是眾芳由少年邁向成年的過渡空間，是渡過青春這一學習階段的特殊場域，一旦年紀漸長，或是許婚字人，就必然要從大觀園中遷出，一如迎春和邢岫烟，而當無情的時間侵逼而來，大觀園的居住者均必須完成通過儀式（未完成者則死亡或者出家，如：黛玉、惜春），而屆時大觀園所無法避免的末日終將轟然到來。

## （二）隨機應變的空間

「異托邦」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作用，大觀園原先是為了元妃省親而建，它的存在是為了頌揚皇權，是因應當時的君臣關係而建築。在省親之後，當它尚處於被敬謹封鎖的狀態時，大觀園不過是一個佔地甚廣的園林空間，一直要到元妃下旨命眾姐妹入園居住，大觀園才轉而成為群芳的青春悠遊之所。但在某些情況之下，如：賈母壽誕、中秋夜宴等特殊節日，大觀園這一空間又轉變為賈府的私家園林。而在迎春出嫁之後回門，大觀園之於她的意義，又成為少女時期美好生活的全部追憶。<sup>36</sup> 由此看來，在曹雪芹原本設計的情節脈絡中，大觀園在八十回後，必然亦會體現與前期全然不同的作用。高鶚作為《紅樓夢》的續書者，雖未能充分掌握大觀園的空間特質與設計，但在他筆下，大觀園從原本「花招繡

<sup>35</sup> 以上有關廖咸浩對《紅樓夢》與成長小說之論述，詳見氏著：《《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台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第三章，「少年與成人——《紅樓夢》的兩種世界」，頁 75-108。

<sup>36</sup> 杜志軍：〈芳園應賜大觀名——大觀園園林書寫的文學意義解讀〉將大觀園視作皇家園林、私家園林、青年居所，亦觸及了大觀園做為異托邦的這一特質，但其論述較著重於大觀園本身的空間作用，忽略了大觀園在居住者心中幽微的空間感。見《紅樓夢學刊》第 6 輯（2015 年），頁 66-84。

帶，柳拂香風」（頁 363）的繁華園林，一變而成爲淒涼寂寞、繪聲繪影的妖異之所，與賈府的飄搖不定兩相呼應，加深了《紅樓夢》的悲劇氛圍，正合於「異托邦」的定義要求。

### （三）空間疊複的古典園林

「異托邦」可以在同一個地方疊加許多不同的場所，古典花園的空間疊複便屬此類。傅柯視古典園林爲「異托邦」已爲許多學者所共知，童明在論述江南園林時，其文開宗明義便以「做爲異托邦的江南園林」爲題，並指出「福柯將園林稱爲最古老的異托邦。在世界上多數的案例中，園林實體是在生活世界中經由圍合、隔離所形成的一種微縮空間，然而它所企圖呈現的，卻是整個世界，一個象徵著臻于完美的世界。」<sup>37</sup> 可見園林做爲一個從現實環境中圈畫出來的特殊空間，本身便兼具現實性與理想性。周寧進一步指出：「古典戲曲中的花園，在空間意義上實際上具有明顯的異托邦功能。任何一個社會，都在構築自己的異托邦，構築一個既在現實之中，又超然于現實之外的地方。」<sup>38</sup> 則文學作品中的花園本即具備異托邦的功能，而異托邦又本就是一個既屬於現實，又超然於現實的特殊空間。執此以觀，則大觀園既是文學作品中的異托邦，又是對應文本現實環境而存在的異托邦，其特質實具雙重肯認。作爲一個寬廣的古典花園，園中又有諸多院落，院落中又有諸多閣樓廂房，其空間之疊複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傅柯在說明「異托邦」這一空間概念時，即舉鏡子爲例，正是因爲鏡子可以產生許多不同層次的空間。而鏡子正是《紅樓夢》一書中極爲重要的隱喻，「風月寶鑑」又是《紅樓夢》的別名之一，蕭馳即認爲鏡子乃是《紅樓夢》的中心意象<sup>39</sup>。在這樣的隱喻與意象系統下，大觀園又被視爲太虛幻境的

<sup>37</sup> 童明：〈做爲異托邦的江南園林〉，《建築學報》（2017年12月），頁98-101。

<sup>38</sup> 周寧：〈花園：戲曲想像的異托邦〉，《戲劇文學》（2004年3月），頁024。

<sup>39</sup> 蕭馳：〈贖脫者與啟悟者的對話：《石頭記》的多重認知視界〉，收入《中國抒情傳統》（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頁272。

人間投影<sup>40</sup>，可見其本身即具備鏡像意義。但論者往往直接將太虛幻境與人間的大觀園等同，順勢導出大觀園之為理想世界的結論，而忽略鏡像具有看似相同，實則有異的性質。既然風月寶鑑不能照正面，既然書中明言「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頁7），那麼大觀園之為「玉兄與十二釵的太虛玄境」<sup>41</sup>，便不能只從理想的角度去認取它，而應注意到它作為鏡像的另一個層面，以了解大觀園這一空間場域本身所具備的辯證特質。

#### （四）異乎尋常的時間感

「異托邦」的空間會打開不同的時間向度，不同於日常生活的時間序列，與傳統的時間斷裂。前文論及大觀園與樂園的差異時，曾指出時間感無法自大觀園中抽離，所以它與樂園定義迥然不合。但不可否認的是，當《紅樓夢》的情節走到大觀園的建立時，其敘述時間確實產生明顯的轉變，王慧指出為了造成盛衰的強烈對比，「自大觀園建成後，全書的敘述速度理所當然地減慢，開始用數回寫一年、甚至只寫一天或半天的事情。」<sup>42</sup>於是大觀園表現出的時間感便顯得緩慢，甚至停滯。高友工也表示「時間在大觀園內似乎靜止」<sup>43</sup>，歐麗娟更透過對賈寶玉〈四時即事詩〉的分析，認為其之所以以四時為題，「微妙地暗示一種永恆境地的自然時間」<sup>44</sup>。王慧認為這種時間感的形成，與大觀園的空間描寫有關，她說：「這種詩化的空間甚至讓我們自覺把時間忽略了。」<sup>45</sup>王慧注意到大觀園時間感的形成與空間描寫有關，但僅將其歸因於空間的詩化，未將其論述與

<sup>40</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44。

<sup>41</sup> （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頁253。

<sup>42</sup> 王慧：〈《紅樓夢》裡的時間與空間——以大觀園為中心〉，《紅樓夢學刊》第6輯（2007年），頁170。

<sup>43</sup> 高友工：〈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收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366。（DOI:10.6327/NTUPRS-9789860282184）

<sup>44</sup> 歐麗娟：〈賈寶玉的〈四時即事詩〉：樂園的開幕頌歌〉，收入《詩論紅樓夢》，頁401。

<sup>45</sup> 王慧：〈《紅樓夢》裡的時間與空間——以大觀園為中心〉，頁179。

異托邦做結合。

童明指出做為異托邦的園林「在時間維度中，周邊的界牆構成了一種相對的遮罩，使得這一隅天地從周邊的喧囂中沉靜下來，避開了那些短暫、瑣碎、斷裂與不穩定，一個具有時間的場所才可能積澱而來，這是一個久遠與當下並置的空間，一個包含所有時間、所有時代、所有形式、所有愛好的願望場所，構成了一種與『時間的積累』相關聯的異托邦。」<sup>46</sup>所謂「時間的積累」會帶來一種時間凝注的停滯感，因此異托邦會呈現出不同於現實世界的時間感，大觀園的時間感之所以令人有恆定的錯覺，正是由此而來。以上學者所謂「減慢」、「忽略」、「暗示」與「似乎靜止」只是一種主觀感受，顯現出時間在大觀園中確實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樣態，但此處時間的「異乎尋常」畢竟不同於樂園的時間感抽離，而是異托邦的空間特質所導致，實際上現實的時間並沒有被改變。

#### （五）既開放又封閉的系統

「異托邦」是一種既開放又封閉的系統，既獨立又可被穿透。筆者以為就這點而言，大觀園的狀況可以分成兩個層面討論。若就具體建築本身而論，前文論及大觀園的封閉性時，曾經提及大觀園與園外的世界乃是以門和圍牆做為區隔，而由於門具有開啓和關閉的功能，因此大觀園與樂園不同，並不是一個與世隔絕、全然封閉的世界。第七十四回，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獻計抄檢大觀園時即點出，大觀園要達到「內外不通風」（頁 1158）的隔絕狀態，必須要在晚上園門全部關閉之後才有可能。由此可知，大觀園雖然看似封閉，但其實與外界可以相互溝通，透過園門和圍牆的圈範，確實賦予某種程度獨立性與封閉性，但這種狀況並非絕對，透過門戶的開啓，園內與園外彼此可相互穿透，甚至有相當程度的流通，而不論是隔絕或是穿透，都有賴於大觀園本身設置即已具備的門戶系統。

然而，若將大觀園視作一個「地方」<sup>47</sup>，實亦存在此「既開放又封閉」、

<sup>46</sup> 童明：〈做為異托邦的江南園林〉，頁 103。

<sup>47</sup> 一個實存的地域如何由空間（space）轉變成地方（place），其實有賴主體感覺與經驗的賦予，如果沒有主體感受的介入，那麼空間永遠只是一個佔據一定體積的立體區域，不具備特

「既獨立又可被穿透」的特點。大觀園中居住者甚多，加上它並不是一個全然封閉的狀態，因此在其中來往流通者亦不少，但這些人卻未必都被視為大觀園的內在成員。她們或許可以進入或居住於大觀園，但面對其中的諸多活動，卻未必夠參與，即使參與，也未必能真正融入。這便是大觀園作為一個「地方」，其封閉性的明顯展現，但這種封閉性又並非絕對，它是可以被鬆動、穿透的，甚至可以對園外的人開放，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王熙鳳，她雖不住在園內，但卻明顯被大觀園中的成員視為一份子，而她自己的認同也同樣投向大觀園，最明顯的證據便是第四十五回，李紈延請王熙鳳為監社御史，鳳姐明白說道：「我不入社花幾個錢，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頁 689）將對大觀園的認同上升到忠誠與否的程度，可見其內在意向之投射。

#### （六）映照和界定現實世界

「異托邦」與現實世界維持一種關係，從而對現實世界具有映照和界定的力量。大觀園之所以總是被視為理想世界，並不是因為它本身屬性的絕對理想，而是與外在世界兩相對照之下顯得格外理想。邱貴芬指出：「造就地方特色的，與其說是這個地方內部原先具有的特質，不如說是它與其他地方互動的結果。」<sup>48</sup>的確，大觀園之所以顯得理想、純淨，正是因為在與外界互動之後，由於外界的骯髒污穢，更顯得大觀園內部清淨無垢，但那並不代表大觀園是絕對的乾淨，它的特質是與外界互動，彼此相互界定之後得出的結果。透過大觀園這一「異托邦」的清淨，更讓人認識到現實世界的穢亂，當兩者之間的對比越趨強烈，從而使大觀園的理想特質高度突出，乃至於絕對化，於是大觀園最後的崩毀便顯得越具悲劇色彩。

---

殊意義。有了主體的介入，空間便會轉換成地方，獲得定義與意義。相關論述，詳見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sup>48</sup> 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卷32第4期（2003年），頁49。（DOI:10.6637/CWLQ.2003.32(4).45-65）

由此可知，大觀園不僅是存在於虛構文學作品中的異托邦，在其文本營造出的現實世界中，它亦是對應於現實世界的異托邦，適如古典園林一般，既現實又超脫，大觀園現實與理想並具的空間特質，正可由此認取。經由上述分析可知，大觀園空間特質的理想與否，主要取決於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並非大觀園本身即具備理想的屬性。本文一再強調大觀園同樣具有現實醜陋的面向，並不是為了否定大觀園中的美好，只是在認取其空間特質時，不能只目及其中屬於靈心蕙質、詩情畫意的一面，亦須認識到光明背後的陰影，因為正是那闇影的隱然流動，最終造成了大觀園的崩毀。由於異托邦除了相對於既有的現實空間之外，本身亦容許相互衝突、矛盾的異質共存，因此將大觀園視為異托邦，方能在大觀園中同時納入理想與現實、純淨與污穢，也才更能理解大觀園如何在兩種力量的拉扯下逐步走向滅亡。畢竟大觀園的滅亡不能簡單地只以外在現實力量的入侵做為解釋，正如探春所說，賈家的敗亡「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頁 1161）一樣，大觀園的崩毀亦是以內部的拉扯、傾軋作為起點。

## 五、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大觀園理想與現實兼具的空間特質，因此首先聚焦在經常被用以描述大觀園空間特質的兩個詞彙——烏托邦與樂園，透過耙梳二詞的定義，了解大觀園與烏托邦、樂園之間的差異。就烏托邦而言，大觀園雖是建立在外在世界的基礎上，但它並非為對治外在世界的問題而來，且其中的秩序亦與外在世界無異，而園內、外的關係雖是動態的，但動向卻非如烏托邦般朝向光明遠景，反而是朝向毀滅，烏托邦最重要的前瞻期望，在大觀園中付之闕如，可知大觀園在本質上與烏托邦並不相同。就樂園而言，大觀園看似封閉，但其實與外界的溝通是暢通的，雖然其中的居住者經過選擇，但在大觀園中當值的人卻未必都經過篩選，而且大觀園的用度必須仰賴外界，並非自給自足，而樂園最重要的特質，即時間感的抽離，在大觀園中並無體現，相反的，時間正是大觀園最大的敵人，由此可知，大觀園亦並非樂園。

其次，筆者援引傅柯「異托邦」的空間概念，藉以重新詮釋大觀園的空間特

質。大觀園之所以看似理想，乃是相對於園外的現實而言，它本身並非絕對的理想世界。異托邦除了相對於既有空間之外，本身亦容許相互衝突的異質共存，因此將大觀園視為異托邦，目的並不在於否定大觀園具備的理想色彩，而是要將現實面納入其中，現實的醜陋不是只存在於園外的世界，而是與美好並存於園中，唯有正視光明與黑暗的兩者並存，才能確切理解大觀園內部的糾結，也才能更進一步了解大觀園在《紅樓夢》整體設計的空間意義。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清）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王慧：《大觀園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

宋淇：《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

（DOI:10.6327/NTUPRS-9789860282184）

馮其庸、李廣柏合著：《紅樓夢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年）。

廖咸浩：《《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台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

歐麗娟：《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歐麗娟：《詩論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鑑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

蕭馳：《中國抒情傳統》（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美）喬錦聲：《紅樓夢：愛的寓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Miche-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J].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e*, October, 1984.

（二）期刊論文

王慧：〈《紅樓夢》裡的時間與空間——以大觀園為中心〉，《紅樓夢學刊》第6輯（2007年），頁165-184。

王慧：〈大觀園研究綜述〉，《紅樓夢學刊》第2輯（2005年），頁278-311。

李豔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紅樓夢學刊》第2輯（1996年），頁91-115。

杜志軍：〈芳園應賜大觀名——大觀園園林書寫的文學意義解讀〉，《紅樓夢學刊》第6輯（2015年），頁66-84。

周寧：〈花園：戲曲想象的異托邦〉，《戲劇文學》（2004年3月），頁22-26。

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卷32第4期（2003年），頁45-65。（DOI:10.6637/CWLQ.2003.32(4).45-65）

張惠娟：〈山色空濛雨亦奇——烏托邦研究近貌〉，《中外文學》卷25第3期（1996年），頁254-264。（DOI:10.6637/CWLQ.1996.25(3).254-264）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卷15第3期（1986年），頁78-102。（DOI:10.6637/CWLQ.1986.15(3).78-100）

張興德：〈曹雪芹對「世外桃源」思想的批判——《紅樓夢》的第三種讀法（之三）兼與「大觀園是世外桃源」說商榷〉，《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25第6期（2006年），頁13-17。

郭玉雯：〈《紅樓夢》與魏晉名士思想〉，《漢學研究》卷21第1期（2003年）。

陳維昭：〈解讀大觀園：透視紅學與 20 世紀文化思潮〉，《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卷 16 第 4 期（2000 年），頁 1-7 轉 59。

童明：〈做爲異托邦的江南園林〉，《建築學報》（2017 年 12 月），頁 98-105。

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15 第 3 期（2005 年），頁 75-96。（DOI:10.30103/NICLP.200509.0004）

（三）會議論文

張錦池：〈論紅樓夢的三世生命說與兩種聲音〉，《紅樓夢學刊》，「'97 北京國際紅樓夢學術討論會專集」（1997 年），頁 179-193。

葛真：〈大觀園平面圖研究〉，《大觀園論集》（台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1-53。

戴不凡：〈曹雪芹「拆建改建」大觀園〉，《大觀園論集》（台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85-99。

龔卓軍：〈異質空間中的移動——從詩學空間到網絡空間〉，《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363-390。

# Both Ideal and Realit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d View Garden are Distinguished

*Chang, Bo-Jun*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 Abstrac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d View Garden embody both idealism and reality. Many proponents of idealism often refer to it as a utopia or paradi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and View Garden and utopia/paradise by defining these terms. It further introduces Foucault's concept of "heterotopia" to reinterpre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d View Garden. Heterotopia allows for the coexistence of conflicting and contradictory elements alongside existing reality. Therefore, considering the Grand View Garden as a heterotopia allows for the inclusion of both idealism and reality, purity and impurity within it, enabl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gradual demise under the pull of these opposing forces. Only by acknowledging the coexistence of light and darkness can one truly comprehend the intricacies within the Grand View Garden and grasp its spatial significance within the overall desig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Keywords:** *Dream of Red Mansions*, Grand View Garde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heterotopia, heterogeneous space